

# 王庆成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大转型

虞和平

---

**【提要】** 改革开放后,中国近代史研究发生了大转型,其根本原因虽是改革开放的时势使然,但亦不可忽视有一批率先与时俱进、锐意开拓创新的著名学者发挥重要倡导和推动作用,其中的重要一员就是王庆成。王庆成以其所在的重要职位、所具有的广博视野和学识,一方面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改进太平天国史研究、开创社会经济史研究,号召社会史研究;另一方面更是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提倡设立城市史、近代化等新领域的课题,并得到全国学界热烈而广泛的响应。由此,他不仅开拓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视野、新领域,而且使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题从先前的只有反帝反封建一个,改变为另有近代化与之并存的两个,在中国近代史研究大转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王庆成 中国近代史 社会经济史 城市史 近代化

---

王庆成于1928年出生,2003年退休,2018年逝世。他于1951年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随即到中央宣传部理论处工作。1959年调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任《新建设》杂志历史编辑组组长。1975年借调到《文物》杂志工作。1977年12月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以下简称“近代史研究所”),历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副所长、所长。学术上擅长太平天国史研究,系该领域著名专家,早年以业余时间从事研究,于1956年开始发表专业文章,调入近代史研究所以后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连续发表重要文章,先后出版太平天国研究专著三种。1986—1990年担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中国近代史学科组组长,积极倡导中国近代城市史、中国近代化(现代化——下同)等新学科的研究。晚年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发表重要文章数篇。

从王庆成的学术生平可以看出,他经历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历史学拨乱反正、推陈出新的重大转型时期。在这一不平凡的变革时期,中国历史学界出现了一批不平凡的杰出学者,他们不仅个人的学术研究取得了突出的创新成果,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引导和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创新发展,王庆成可谓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创新发展发挥了具有转型意义的推动作用。

## 一、对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拨乱反正和承前启后

王庆成的研究专长是太平天国史,其主要成果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对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拨乱反正相伴而生。太平天国史是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个传统热门学科,在民国时期就已有不少学者进行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又是中国近代史“八大事件”中最受学界重视的一个事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成为中国近代史中被“四人帮”歪曲利用最为严重的一个领域。“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史学界立

即展开了对“四人帮”“影射史学”的批判和清算。1978年对太平天国史方面的“拨乱反正”率先成为热点,这一年的《历史研究》发表相关文章七篇,约占中国近代史学科所发文章总数(19篇)的37%,其中王庆成一人发表了两篇,即《关于“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太平军内部对建都问题的论争及其影响》。这两篇文章以纠偏补缺的纯学术研究,纠正“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相关歪曲和偏执论调。王庆成在第一篇文章的结尾中指出“洪秀全是伟大的历史人物,他作为太平天国反封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人而对历史有杰出贡献。但他不是没有自己的弱点。‘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改号改政不是什么两条路线斗争的大事,对改号改政的态度不是什么评价太平天国人物的标准;相反,我们应该按照历史原貌而对改号改政给予认识和评价。没有接受‘改政’的陈玉成而为太平天国尽忠到底,很早就遵制遵改的陈炳文却终于向清朝呈递投降禀帖,而且在禀帖上盖上‘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的官印,‘改政’之不能检验太平天国人物的功罪,不是很明显的吗?”<sup>①</sup>这里,他首先提出并自行对洪秀全作实事求是的研究。

1980年3月,王庆成在《人民日报》发表《太平天国研究中的新问题》一文;1981年6月又在《历史研究》发表《太平天国研究的历史和方法》一文。这两篇文章指出了“四人帮”垮台后太平天国研究中出现的对一些重要问题的新探讨,以及仍然需要进一步澄清和深入研究的问题,并特别强调了以下两点。

第一,对历史事件的研究不能脱离其所处的时代,主张进行历史事件及其社会环境的整体研究,把事件史研究拓展到时期史研究。对于这一点,王庆成论及了三层意思。首先,在评论有关太平天国是封建政权还是革命政权的不同观点中论及了时代性的问题,他说“这些不同的看法,大都是从太平天国的思想意识、政治制度、土地政策等方面来立论,都注意到了太平天国在这些方面的封建性因素。太平天国革命是在刚刚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发生的,它在各个方面从开始就带有封建性,是不言而喻的。”<sup>②</sup>这就是说,太平天国虽是一次反清的革命运动,但它不能完全超越历史条件的局限,要把这一历史事件放到其所处的初入近代这一时代环境中进行研究。

其次,在对民国时期及新中国建国之初,有关太平天国起义性质是农民战争、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市民革命的三种说法的评论中,论及了历史研究要切合历史环境的问题。他指出“研究这样的问题,需要对太平天国本身的思想、政策的性质、作用、后果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同时还应对当时中国整个社会的性质有切合实际的认识。列宁说‘在全部社会经济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条件下,任何反对中世纪制度的农民革命都是资产阶级革命。’根据列宁的这一意见,认为太平天国是一次农民革命而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似乎需要切实地研究当时中国的全部社会经济是否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或在什么程度上带有这种性质。这是一个很大的科学问题,当然不是从名词、概念方面所能解决的。”<sup>③</sup>“所以,对太平天国的研究来说,凡是太平天国所由产生的和对它的斗争起了影响的当时各种社会因素,如经济、地理、文化、民族、民俗、心理、宗教、法律、人口等等,都应该在我们的视野之内,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加以研究。”<sup>④</sup>于此,王庆成强调对太平天国性质的研究,不能只从名词和概

① 王庆成《关于“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历史研究》1978年第9期。

② 王庆成《太平天国研究中的新问题》,《人民日报》1980年3月6日。

③ 王庆成《太平天国研究的历史和方法》,《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

④ 王庆成《太平天国研究的历史和方法》,《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

念出发进行演绎、解释,而是既要研究太平天国本身的所作所为,更要研究其所处时代的全部社会经济状况,即整个时代环境。

最后,从太平天国研究而论及近代全部重大事件研究,提出历史“土壤”之说,将事件和时期相融合,从而将事件史研究的视野扩大到时期史。他认为“要具体地理解太平天国及其斗争,就不能只限于研究这些斗争本身,而必须同时研究这些斗争所由产生的整个社会和社会生活。两个过程、三个高潮、八大事件的中国近代史体例,突出了中国一百多年来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大事件,但如果只重视这些事件本身而忽略了产生这些事件的土壤,忽略了当时社会的结构和大多数人的生活 and 思想,那末,对大事件的性质和面貌的认识也难以把握其具体的历史特点……我们只有既研究大事件,又研究整个的社会和生活,才能真正了解历史是我们的昨天和前天。”<sup>①</sup>在此,王庆成从太平天国史研究论及了整个近代史主轴和重大事件研究,提出了必须重视研究这些事件产生的“土壤”,即包括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思想等主要元素在内的整个社会环境。这就突破了以往就事件论事件的研究方式,进而将事件史研究推进到时期史研究。王庆成的这一主张是很前卫的,与当时正在主编《辛亥革命史》的章开沅所强调的要“研究辛亥革命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sup>②</sup>乃至提出“社会历史土壤学”,<sup>③</sup>可谓是不谋而合,异曲同工。此后,从时期史的范畴研究事件史逐渐成为史学界之共识。

第二,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不能概念化、脸谱化。王庆成在关于太平天国领导人研究的评论中说:“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以来,对于历史人物的研究,尤其是对于太平天国人物的研究,作出某种政治鉴定,例如是否‘叛徒’、是否‘野心家’、是‘变节’还是‘变节行为’等等,似乎被当作了这种研究的目的和内容。戚本禹所传布的这种恶劣影响,往往使历史人物的评价纠缠于这些政治概念的争论,从而降低了科学研究的性质。”<sup>④</sup>他们把“生动、丰富的历史现象,变得极度的贫乏,脸谱化、简单化、公式化”。<sup>⑤</sup>王庆成在批判戚本禹、梁效、罗思鼎这种把“历史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的“恶劣手法”的同时,还提出了历史人物研究应该实事求是,从具体人物的具体处境和作为出发,应该研究“人物怎样和为什么参加了某一历史过程,他对此过程起了什么作用,为什么起这样的作用,等等”。<sup>⑥</sup>

王庆成指出的这种人物研究的概念化、脸谱化现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最为突出,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也有不同程度的存在。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太平天国人物研究中,也存在于其他历史人物研究中,如在资产阶级人物和辛亥革命人物研究中,对人物的戴帽、摘帽、分界、划线以及相应的概念化定性和评判是当时研究的主要路径和内容。因此,王庆成实事求是研究历史人物的主张,不仅对太平天国人物研究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而且对其他方面历史人物的研究也具有纠偏拓新的功效,如对太平天国人物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的研究;对辛亥革命人物黄兴、宋教仁、黎元洪的研究;对资产阶级人物张謇、郑观应、虞洽卿的研究,类皆如此。

王庆成在进行上述拨乱反正工作的同时,也展开了自己对太平天国史的新研究。他于1985年1月出版了《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一书。该书由他当时研究太平天国史的论文集结而成,所涉内容

① 王庆成《太平天国研究的历史和方法》,《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

② 章开沅《〈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自序》,《章开沅文集》第11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61页。

③ 章开沅《我的史学之路》,《章开沅文集》第11卷,第342页。

④ 王庆成《太平天国研究中的新问题》,《人民日报》1980年3月6日。

⑤ 王庆成《太平天国研究的历史和方法》,《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

⑥ 王庆成《太平天国研究的历史和方法》,《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

包括史事考释、思想源流、宗教方式、人物辨识和研究方法,旨在对太平天国研究“别开蹊径”。<sup>①</sup>该书开拓创新的价值,可以从太平天国研究的先辈权威学者罗尔纲的评介中见之。罗尔纲说:该书有“下列几个特点:(一)对有关太平天国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例如关于洪秀全早期思想及其发展、关于金田起义的事实和过程、关于建都问题的论争及其影响、关于太平军的编制制度、关于儒家墨家同太平天国上帝的关系等等,本书都在独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看法……对推动太平天国研究的深入发展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二)开阔了太平天国研究的领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宗教问题、民族问题等,特别是关于太平天国的宗教……扩大了对太平天国、对洪秀全研究的范围……他不是单纯地就宗教谈宗教,而是力图通过对太平天国宗教的分析来认识太平天国的思想和历史。”(三)重视理论思维,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指导历史研究。”罗尔纲又重点指出:作者“有细微的功夫,又在理论锻炼上有一定的修养,因而他研究问题既观察入微,同时又能从微知著。如本书《圣神风、圣神电及其他》一篇,他抓着‘圣神风’、‘圣神电’这些别人忽视的微细的地方,然而也正是反映太平天国历史的重大地方,进行分析,进行有关的联系研究,丝丝入扣地指出了太平天国的重大历史,特别是后期的历史,便是其中最精密的一篇”。<sup>②</sup>

此外,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外国学者也非常看重此书。如书中《论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及其发展》一文,“当时以魏斐德(Frederick Wakeman)为首的美国明清史研究访华团,在其专刊中对该文作了详细介绍;英国研究太平天国史专家柯文南(Charles Curwen)将该篇译为英文在 *Randitions* 发表”。<sup>③</sup>后来他们二人也成了王庆成的学术知交。

王庆成的研究虽然立足于太平天国,但其创新思路及于整个中国近代史。他不仅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创新了太平天国史研究,起到了明显的承前启后作用,而且其研究思路和方法对近代史研究的众多领域具有启发意义和先导价值,发挥了实实在在的积极影响。

## 二、对中国近代经济史和社会史学科的推进

王庆成在开拓创新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同时,也大力拓展和提倡中国近代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近代经济史研究虽然早已有之,但主要从属于经济学或政治史领域,前者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宏观经济学的范畴进行纯经济史研究;后者如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土地制度和生产关系、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和软弱性等,以论证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从历史学角度进行经济史研究者甚少,在历史研究中处于可有可无的边缘和点缀状态。鉴于此,时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的刘大年于1981年发表文章,指出中国近代经济史是整个近代史研究的基础,如果要把历史研究真正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就必须认真研究经济史,近代经济史研究是当前深入研究近代史的最重要课题和突破口,<sup>④</sup>强调了近代经济史研究对深入研究近代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随后,便决定在近代史研究所开展近代经济史研究,成立经济史研究室,并将这一任务交给了王庆成。

① 王庆成《我和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回望一甲子:近代史研究所老专家访谈及回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566页。

② 罗尔纲《序》,王庆成《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页。

③ 王庆成《我和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回望一甲子:近代史研究所老专家访谈及回忆》,第567页。

④ 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光明日报》1981年2月17日。

1982年8月近代史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正式成立,王庆成任室主任,担起了在近代史研究所开创近代经济史学科的重任。对于近代史研究所来说,成立经济史研究室基本是白手起家。当时近代史研究所的经济史研究力量极为薄弱,老一辈研究人员中仅有樊百川一人专攻近代经济史,从翰香研究明清经济史,但他们两位因另有任务不参加经济史研究室的工作,其余就只有刚涉足于这一领域的笔者和另一位年轻人。王庆成在接受这一任务后,立即进行部署:一是陆续调入几个对经济史有兴趣、有研究的人员和硕士研究生;二是求助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邀请宓汝成时常指导,并在1983年3月至1984年6月王庆成出国访问期间代理研究室主任;三是摸底探路,即摸清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已有状况,探索本研究室的研究方向和领域。如此三管齐下,经济史研究室的工作很快步入轨道。特别是第三方面的工作对研究室日后工作的布局和发展颇有筑基意义。

王庆成虽然当时尚未研究经济史,但他在太平天国史领域已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有丰富的历史研究经验,深知应该如何开展创建一个新学科的研究工作,应该怎样培养研究人员。他指教笔者说,经济史研究在我们研究所虽然是一个新的领域,但是在学术界已有不少学者做出了优秀的成果,特别是本院经济研究所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多位前辈,都是成绩斐然的,我们要做出成绩来、做出特点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先要全面了解和学习前辈们的研究成果,然后选择我们的研究方向和课题。他还认为,近代史研究所的经济史研究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础学科,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选择什么特色和方向,则必须从已有的研究状况中寻踪觅迹。因此,他首先布置全室人员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目录和提要,1949—1985》一书,以便摸清新中国成立以来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情况,自己亲自负责,后因出国访问才请宓汝成代为负责,具体编写工作由笔者执行,包括选文、分类、摘要、统稿。该书最后由王庆成审阅定稿,于1989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全书分23个领域、68个类别,收集论文提要298篇、论文目录2158条、著作目录235条。这种基础性的学术探源工作,在当时是极其罕见的,也是创始性的,它虽然不是正式的学术研究,但是对学科建设和年青研究人员的培养具有非常重要的奠基作用,后来也成为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必修功课和必由路径之一。

从经济史研究室的建设来说,这项工作可以说具有筑基、开路之功效。该项摘编工作由研究室多位人员按类分工进行,由此使参与者对自己所分编类别的研究状况有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为自己后续研究的定向、选题打下了较好的学术基础。同时,通过分类编写目录和提要,理清了已有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和问题,对研究的布局分工颇有帮助。1985年7月王庆成任副所长,次年从翰香继任经济史研究室主任,对研究室各成员的研究工作进行了基本规划,涉及工业、农业、手工业、现代化、经济制度、资产阶级等领域,基本奠定了研究室的学科布局。就笔者个人而言,在这项工作中收益巨大,在此基础上写成了《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的历史和现状》一文,当时被同行学者誉为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学产生发展过程研究的一篇最系统的文章,由此笔者基本上掌握了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过去和现状、重点和弱点、成见和新见,也基本选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资产阶级和近代工业。

通过上述的学术摸底工作,为经济史研究室选定学科方向提供了重要依据。借鉴以往研究成果的结构和分布,从作为近代史研究的基础和本室研究特色两个角度出发,王庆成和研究室成员都认为本室的研究方向定为近代社会经济史比较好。其具体定位是,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说,主要采用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相结合,以历史学为主;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要重视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如经济与民生、阶级、政治之间的互联互动;从近代史研究所经济史研究特色的角度来说,要注重以

往研究的薄弱环节,如阶级、制度、工业化、农村经济。总的来说,就是不仅要研究经济发展的现象,更要研究经济现象背后的社会制约因素及其互动关系。在此之前,由于中国近代经济史主要被作为宏观经济学的一部分来对待,研究对象主要是部门、行业、企业、财政,本经济史研究室选定近代社会经济史作为研究方向,在当时可谓是先树一帜。后来,社会经济史日益受到经济史学界的重视。

王庆成担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后,个人的组织编制仍在经济史研究室,对经济史研究室的研究工作仍然十分关心并给予大力支持。他先帮助从翰香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近代华北农村研究”项目,后又指导笔者申报“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项目,均获得成功。这两个项目,使经济史研究室形成了两个研究重点,特别是“近代华北农村研究”项目(后来以《近代冀鲁豫乡村》为名出版),由于研究室的大多数成员参加,从而培养了多位这一领域的研究人才。这两个项目在1993年出版成书以后,在国内外史学界产生了较大反响;1999年二书均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优秀成果奖”三等奖,一室同时获两项国家级奖实属罕见。

除了选定和支持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之外,王庆成还在近代史研究所和经济史研究室积极提倡社会史研究。社会史正式复兴于1986年,是年1月冯尔康发表《开展社会史的研究》一文,<sup>①</sup>接着乔志强等先后发文提倡社会史研究;同年,首届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在天津举行。当时,王庆成也十分重视社会史研究,1988年在他接任所长之时,便在全所会议上提倡开展社会史研究,还曾有过成立社会史研究室的动议。王庆成的这一倡议很快引起所内不少研究人员响应,相继选择社会史研究或从社会史角度研究政治、文化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除了社会经济史之外,又有文化史研究室开辟社会文化史研究、政治史研究室提出社会政治史研究,成为近代史研究所的新品牌。

王庆成还身体力行从社会经济史和社会史方向指导自己的博士研究生。他从1988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先后共招生七人,他们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夏春涛《太平天国宗教》、穆益斌《清中期白莲教起义和太平天国起义——思想和行为的比较》、常宗虎《南通现代化(1895—1938)》、朱谐汉《太平天国后期的江南农村社会研究》、朱从兵《铁路与社会经济——广西铁路研究(1885—1965)》、刘悦斌《薛福成外交思想研究》、宾长初《广西近代圩镇研究》。这七篇博士论文中,有四篇属社会经济史范畴,有两篇属社会史范畴,有一篇属于外交史,均在所涉领域具有程度不等的开创性价值。于此可见王庆成将社会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倡导寓于博士生指导之中的用意十分清楚,可谓是用意良苦。

为了开拓和促进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王庆成还发起了译介国外相关名著,以供国内相关研究者参考和借鉴的工作。他于1986年组织编委会,选译“外国学者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侧重于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等方面有参考借鉴意义的专著”出版,命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由于笔者一直参与该译丛的事务工作,先当秘书,后来当编委、副主编、并立主编,当时的一些编务资料都由笔者保管。据笔者所知,该译丛从1987年起陆续交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到1999年先后出版了(美)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美)孔飞力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美)费维恺的《中国早期工业化》、(英)杨国伦的《英国对华政策(一八九五—一九〇二)》、(美)陈锦江的《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美)施坚雅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日)滨下武志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七种。此后至2009年,又陆续出版(美)K. E. 福尔索姆的《朋友·客人·同事:晚清幕府制度研究》、(美)芮玛丽的《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

<sup>①</sup> 冯尔康《开展社会史的研究》,《百科知识》1986年第1期。

(1862—1874)》、(美) R. J. 史密斯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常胜军: 外国雇佣兵与清帝国官员》、(日) 久保亨的《走向自立之路: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的关税通货政策和经济发展》、(以色列) 谢艾伦的《被监押的帝国主义: 英法在华企业的命运》、(日) 古田和子的《上海网络与近代东亚: 19世纪后半期东亚的贸易与交流》六种。此外, 还有已经选定但因各种原因未能出版的著作, 如(日) 坂野正高的《近代中国外交史研究》、(澳) 颜清煌的《华工与官员: 清季中国对海外华人的保护》、(美) 墨菲的《外来者们: 西方列强在印度和中国的经历》、(加) 陈志让的《中国与西方: 1815—1937年的社会文化与比较研究》、(美) 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法) 白吉尔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法) 卫青心的《清末五口通商与传教自由(1844—1860)》或《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七种。<sup>①</sup> 另有推荐备选的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费正清著《中国: 传统与转变新解》《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史华慈著《寻求富强: 严复与西方》、瞿同祖著《清代地方政府》、王业键著《1750—1911年中华帝国的土地税》、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 辛亥革命在两湖》、张馨保著《林钦差与鸦片战争》八种。就王庆成的这一规划而言, 这无疑是一个规模相当大的译丛, 可惜由于出版社方面进行经济效益“改革”, 出版事项遇到困难, 最终付之出版的只有13种著作, 其他未能出版的著作后来大多转为其他出版社组织的译丛出版。

该译丛出版的数量虽然不多, 但其意义不可低估。从上述已经出版和已选、备选的这些国外学者的著作可以看出, 王庆成以此开拓和促进我国近代史, 尤其是近代社会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的用意是很明显的。这些著作基本可以归类为三个方向, 最多的是社会经济史, 其次是社会史, 最少的是中外关系史。此外, 该丛书是改革开放后第一套翻译丛书, 在促进中外学术交流上具有开创性意义。这些译著的出版也在实际中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和近代史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 三、为中国近代史学科开辟新天地之一: 城市史研究

王庆成在近代史研究所提倡和推进新研究领域的同时, 还努力推进整个近代史学科的创新。据王庆成自述“我在研究所任职期间, 全国成立社会科学基金会和全国社会科学规划委员会, 中国近代史曾为其中的单独一组, 我任组长。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 过去都是以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等事件为主轴; 我所做的最主要的一件工作, 是对近代史学科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构想, 提出中国近代史应重视对近代农村、城市、边疆、文化、华侨、近代化等问题的研究。这一与原范式大不同的构想, 得到了‘中国近代史学科规划组’的赞成, ‘七五’规划即以此为主要内容。我相信, 这为当时中国近代史学科开辟了新的天地。”<sup>②</sup>这里所说的是1986年的事情, 也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成立和资助学术研究的第一年, 其中的学科评议工作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 王庆成受命负责近代史学科组的工作, 自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所提出的这些建议也非常新颖合时, 获得了评议组专家们的赞同, 并得到一一落实。王庆成这些新构想的提出和落实, 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在领域、方法乃至体系上的大转型, 特别在近代城市史、近代化(现代化)两个方面, 发挥的推动作用尤为明显。

在近代城市史研究方面, 可谓是有培育新学科之功。1986年,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中国近代史

<sup>①</sup>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编委会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函》, 1990年3月24日, 笔者自藏。

<sup>②</sup> 王庆成《我和近代史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回望一甲子: 近代史研究所老专家访谈及回忆》, 第569—570页。

学科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个城市研究课题列入国家重点研究项目,引起了史学界的巨大反响,城市史研究在中国开始快速兴起。对此,这几个课题的主持者或参与者,都作出了肯定评价。如上海城市史课题参与者,后来成为著名专家的熊月之说“这几个规划项目,标志着中国史学界对城市史的高度重视,开创了新时期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先路。此后,中国史学界关于单体城市史的研究,如雨后春笋。”<sup>①</sup>天津城市史课题参与者,后来成为著名专家的刘海岩说“作为‘七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的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个近代城市史研究课题的相继完成和出版问世,一批较有水平的城市史论著的出现,愈来愈多的学者对近代城市史发生兴趣并从各个角度参与研究,这些都表明,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并逐渐成为近代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sup>②</sup>重庆城市史课题组成员,后来成为著名专家的何一民说“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潮流的兴起是以1986年国家‘七五’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个近代新兴城市的研究开展为起点。”<sup>③</sup>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对中国城市史学科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导和培育作用。<sup>④</sup>武汉城市史课题主持人、著名专家皮明麻说:在近代城市史研究上,“解放后三十多年,这一领域亦为视野所不及,在近十年来,我国才着手城市史的学科构建……特别是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将沪、津、汉、渝近代城市研究列为重点项目……成为城市史学科形成的催化剂,推动城市史研究工作走向活跃”。<sup>⑤</sup>从这四位自1986年以来一直从事城市史研究的著名学者的评价来看,国家“七五”社科规划设立“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项目,对中国城市史学科建设起到了“开创”“引领”“培育”和“催化”的重要作用。

城市史研究“走向活跃”的一个主要表现,是四个课题组轮流组织的近代城市史学术讨论会的连续举行。首先,1988年9月上海城市史课题组所在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率先举办“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上述几个课题组的成员之外,还有来自国内和美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的八十多位学者。会议讨论的内容包括“近代上海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工业、金融、资产阶级、市政与警察、帮会与娼妓、市民社会生活与文化心态、上海与西方等专题”;<sup>⑥</sup>同时还举行了四个课题组的座谈会,交流编写工作状况,并商定以后继续每年由其他三个课题组轮流主办一次城市史研究学术讨论会。笔者随同王庆成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指出开展城市史研究对开拓近代史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如何开展城市史研究等。<sup>⑦</sup>此后,在1989—1991年,由重庆、武汉、天津城市史研究课题组相继举行第一、第二、第三届“近代中国城市研究学术讨论会”。第一届会议于1989年11月在四川大学召开,“由四川大学城市研究中心和《近代重庆城市史》课题组主办。参加会议的有上海、北京、天津、武汉、重庆、昆明、成都、广州等城市从事地方史、近代史和城市史的有关专家和学者60余人。”会议以近代城市研究为中心议题,就城市史研

① 熊月之、张生《中国城市史研究综述(1989—2006)》,《史林》2008年第1期。

② 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

③ 何一民、曾进《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进展、存在问题与展望》,《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4期。

④ 何一民、杨洪勇、郭明攀《中国城市史研究课题的进展及趋势——基于2011~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立项数据的分析》,《城市史研究》第44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

⑤ 皮明麻《城市史研究略论》,《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

⑥ 张仲礼等《上海史研究的首次国际学术盛会——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洪泽等主编《上海研究论丛》第4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88页。

⑦ 王庆成《对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看法——在“上海城市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发言》,洪泽等主编《上海研究论丛》第4辑,第329—333页。



研究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线索、近代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近代城乡关系、近代城市的发展模式及特点等问题展开讨论。<sup>①</sup> 这届会议与上海会议相比,参会的国内学者来源更加广泛,议题含有更强的专业性和学科性。后续的第二、第三届会议,规模与第一届相仿,议题则进一步深化,如由武汉课题组所在的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等在宜昌举行的第二届会议,“围绕城市史研究的对象及方法、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线索、上海、武汉、重庆等大中城市发展演变的特点、中国城市化道路等问题”,<sup>②</sup>展开讨论。

与此同时,随着这几个课题的进行,培养了一批城市史研究人才和专门研究机构。诚如何一民所言“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不受重视,研究者寥寥无几,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学者。1986年后情况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史的人逐渐增多,并形成了以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个课题组为基础的四个研究近代城市史的基地,形成了一支较有实力的研究队伍,各课题组的一些中青年教师和科研人员通过十余年的努力,逐渐成长起来,成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骨干和中坚,其中不少人已成为颇有成就的教授和研究员。”<sup>③</sup>在机构方面,1988年即有四川大学以重庆城市史研究课题组为基础成立的“四川大学城市史研究中心”;1990年,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以天津城市史研究课题为契机,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城市史研究》刊物;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将原来的“历史研究所”更名为“城市历史与文化研究所”,以课题组骨干涂文学为所长,后来涂文学调到江汉大学工作后又成立“江汉大学城市研究中心”。在人才方面,不仅这四个课题的主持人都一举成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第一代著名专家,而且有更多的第二代专家通过参与课题研究逐渐成长起来。由此可见,随着这四个城市史课题的设立和研究工作的展开,带动城市史研究的队伍逐渐扩大,人才逐渐成长,学科逐渐建立。

1993年,上列四个城市史课题的研究成果均已全部出版,意味着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和学科建设告一段落。由于笔者一直跟随王庆成参与一些城市史研究的活动,也很有趣,力图挤入这一行列;又在王庆成的领导下一直参与《中国历史学年鉴》近代史部分的组稿和编辑工作,于是奉命为《年鉴》写了一篇有关几年来城市史研究的述评文章。笔者的体会是:这四个课题的设立和研究,不仅直接推进了这四个城市史的整体性研究,“同时也带动了其他城市史的研究,如北京、广州、大连等城市史研究已有著作问世,有些城市已开始有比较全面的城市史研究,至于某个专题方面的城市史研究论著则涉及更多的城市。不仅单个城市史研究的对象逐渐扩大,由通商口岸城市和大城市向其他类型城市和中小城推进,而且开始着手于群体城市史、区域城市史和城市间的联系和比较研究。这几年的研究成果和动向表明,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已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热门和新兴的学科,并基本形成了学科体系”。<sup>④</sup>这虽是笔者的一己之见,但也反映了这几年来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发展的总体状况,亦为多数同行所认同。

对于王庆成在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和学科建设上的推动作用,天津城市史课题主持人罗澍伟曾说“在整个课题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应当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庆成教授,是他率先倡导应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中加强城市史研究,每当我们在研究工作中遇到难点而畏惧不前的时候,总是他循循善诱,为我们鼓起勇气。”<sup>⑤</sup>罗澍伟所言可能有谦虚客气的成分,但也反映了王庆成对该项课题的倡导、支持和帮助。

① 何一民、谢放、王笛《近代中国城市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四川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② 《全国第二届城市史讨论会》,武汉年鉴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年鉴(1991)》,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309页。

③ 何一民、曾进《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进展、存在问题与展望》,《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4期。

④ 虞和平《中国近代城市史》,《中国历史学年鉴(199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83—195页。

⑤ 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后记”,第783页。

## 四、为中国近代史学科开辟新天地之二：近代化研究

在近代化研究方面,王庆成可以说有为近代史增辟主题之功。王庆成在主张设立近代城市史研究国家课题的同时,也主张设立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研究的课题,1986年设立了两个课题,一个是北京大学罗荣渠主持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另一个是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主持的“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这两个课题的设立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中国史学界,尤其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迅速掀起了一个近代化研究的高潮。首先是这两个课题组及所在单位率先行动起来,1986年11月,世界史学界先行作出反应,举办了中国大陆第一次有关现代化的专题学术讨论会,“由《历史研究》编辑部、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世界近代史研究会等单位联合发起,在安徽省黄山市召开了‘世界近代史上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与资产阶级历史作用’学术讨论会。全国近四十个有关单位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以“现代化概念”“现代化的标准”“政治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的关系”“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地位”等为主要议题。<sup>①</sup>随后,中国近代史学界也开始行动,于1987年5月在武汉举行第一次近代化专题讨论会,名为“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委会、《历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来自美国、日本、中国内地及香港地区的近八十名学者参加会议,围绕着“中国近代化的内涵和起始时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内部和外部因素”“对外贸易与中国近代化”“中外投资与中国近代化”等问题展开讨论。<sup>②</sup>

紧接着,这两个课题之外的近代史学界密集举行各种类型、各个方面的有关近代化的学术研讨会。例如,1987年6月在苏州举行“近代中国与中国近代化青年史学工作者讨论会”,“围绕中国近代化道路这个主题,就中国近代化道路的特点与规律、传统文化与中国近代化、西方文化与中国近代化以及农民阶级与中国近代化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sup>③</sup>8月在南京举行“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主要议题是张謇在中国近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sup>④</sup>9月在武汉举行的“中国走向近代的文化历程学术讨论会”,第一个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问题”。<sup>⑤</sup>

此后,近代化的研究视角和范式逐渐涉及中国近代史传统体系结构中最重要“八大事件”和“三次高潮”。如1988年11月在广东南海、新会举行的“戊戌变法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主题是“戊戌维新运动与中国近代化”。<sup>⑥</sup>1989年在上海举行的“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化学术讨论

① 海林《“世界近代史上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与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讨论会纪要》,《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世界近代史上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与资产阶级历史作用讨论会在安徽省黄山市召开》,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编《中国历史学年鉴(1987)》,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8—289页。

② 《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举行》,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编《中国历史学年鉴(1988)》,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4—266页。

③ 《近代中国与中国近代化青年史学工作者讨论会在苏州举行》,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编《中国历史学年鉴(1988)》,第272页。

④ 《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行》,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编《中国历史学年鉴(1988)》,第289—290页。

⑤ 《中国走向近代的文化历程学术讨论会在武汉举行》,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编《中国历史学年鉴(1988)》,第298—299页。

⑥ 《戊戌变法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广东南海—新会举行》,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编《中国历史学年鉴(1989)》,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7页。

会”<sup>①</sup>虽然会议内容涉及现代化不多,但会议名称明显突出了“现代化”这一导向。在山东东营举行的“第五届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围绕着‘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这一主题进行认真的探讨”,涉及“中国近代化早期的特点”“中国近代化的内涵、分期、途径、特点以及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等问题”。<sup>②</sup>1990年举行的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成立暨第一届学术年会,着重讨论三个问题,其中一个“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sup>③</sup>同年,青岛举行的“义和团运动90周年学术讨论会”,第一个议题是“义和团与近代化的关系”。<sup>④</sup>在桂林举行的“中法战争史学术讨论会”,讨论了“中法战争与中国近代化、中法战争与洋务运动”问题。<sup>⑤</sup>在山东威海举行的“甲午战争史学术讨论会”,第一个议题是“甲午战争与中国近代化问题”。<sup>⑥</sup>在广州举行的“中国近代史开端15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近代化问题”成为三个主要议题之一,讨论的内容“包括近代化的内涵与道路,近代化理论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近代史开端与近代化的关系,时空差异对近代化开端的影响,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及若干历史人物对近代化的影响,以及城市化、城市经济及行会组织的近代化等分支的研究”这些讨论“主要侧重于三个方面,一是近代化与近代史进程的关系……二是近代化与资本主义化的关系……三是近代化与西洋化的关系”。<sup>⑦</sup>1991年10月,由中国史学会和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在武汉举行的“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其中一个议题是“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经济与近代化”。<sup>⑧</sup>

在史学界众多的近代化学术活动和具体学术研究中王庆成很少直接参与,但他一直关注和重视这一近代史研究的新方向。1987年6月王庆成赴日本参加由日本国际文化会馆主办的“中日近现代史和二十一世纪”学术讨论会,他作为特别评论员在大会作题为“19世纪中国的近代化问题”的发言。可惜这一发言没有正式发表,也没有留下文稿,在日本方面也找不到有关资料,但在这样的会议上讲中国的近代化问题,将中国近代化问题与21世纪相关联,无疑表明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视。1990年近代史研究所为纪念建所40周年,王庆成作为所长负责筹办了“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参会论文中有五篇文章以“近代化”为主题,特别是名誉所长刘大年的主旨发言题为“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与世界的关系”,<sup>⑨</sup>这无疑点明了此次会议的要义所在。这表明王庆成和近代史研究所也已进入近代化研究的潮流之中。

更为重要的影响是近代化研究的开展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开辟了第二个主题或主线。在近代化

- 
- ① 《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化学术讨论会在上海举行》,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编《中国历史学年鉴(199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294页。
  - ② 《第五届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在山东东营举行》,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编《中国历史学年鉴(1990)》,第318—320页。
  - ③ 《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第一届学术年会在南京举行》,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编《中国历史学年鉴(1991)》,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59—360页。
  - ④ 《山东省举行义和团运动90周年学术讨论会》,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编《中国历史学年鉴(1991)》,第367—368页。
  - ⑤ 《中法战争史学术讨论会在桂林召开》,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编《中国历史学年鉴(1991)》,第372—373页。
  - ⑥ 《甲午战争史学术讨论会暨山东省甲午战争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威海举行》,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编《中国历史学年鉴(1991)》,第380页。
  - ⑦ 《中国近代史开端150周年国际研讨会在广州举行》,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编《中国历史学年鉴(1991)》,第389—390页。
  - ⑧ 《编辑说明》,中华书局编辑部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华书局1994年版。
  - ⑨ 刘大年《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与世界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科研组织处编《走向近代世界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4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

研究正式启动之前,中国近代史只有反帝反封建一个主题,改革开放之后虽在洋务运动研究中提出过“沉沦”和“上升”(“反动”和“进步”)两条主线之说,但不能获得多数近代史研究者的认同,分歧很大。近代化研究正式启动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逐渐以反帝反封建和近代化两个主题取代“沉沦”和“上升”两条主线说,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赞同将近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第二个主题。

1987年8月在湖南桑植举行的“中国近代史体系体例学术讨论会”上,以湘潭大学徐泰来为主的一些与会学者首次提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是资本主义的近代化”。<sup>①</sup>1988年年初,徐泰来发表文章正式提出这一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就是资本主义近代化以及围绕近代化所展开的一系列斗争”,“中国要近代化,但不要殖民地化;而外国列强则要使中国殖民地化,而不允许中国独立的近代化。这就是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矛盾的核心内容。”<sup>②</sup>他在改革开放后率先兴起的洋务运动历史作用大讨论中一直支持和采用“进步”和“上升”之说,到这次会议进而提出近代化“主题”之说。1989年,在湖南大庸市举行的“中国近代史宏观研讨会”上,一个主要的议题是中国“近代化问题”,“较多的同志认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主线是资本主义的近代化,有的同志更多地强调资本主义近代化独立进行的意义,有的同志则提出独立和近代化是近代历史的主旋律”。<sup>③</sup>可见,持近代化主线说者有所增加,并开始提出“独立和近代化”两个并列“主旋律”,但是尚不足以动众。

到1990年,在近代史研究所举行“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和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的刘大年发表了重要的主旨报告,对近代化与近代史主题的关系作了权威性的论述。胡绳在会议开幕式上作题为《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并于10月1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他指出“在近代中国前面摆着两个问题:即一、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显然是密切相关的。”刘大年也在开幕式上作题为《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与世界的关系》的主旨报告,并发表于同年的《求是》第22期。他提出“近代世界的基本特点不是别的,就是工业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近代化。适应世界潮流,走向近代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资本主义世界“从自己的利益需要出发,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传播到了中国,使中国出现了向近代化道路上起步的某些条件和可能”。但是,中国人当时最紧迫的,是要“去推倒阻止中国走近代化道路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大山,而不可能是如何去实施近代化”。他们两人的讲话指出了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化的三个基本原则:一是历史基本趋势,即近代中国走向以工业化为主的近代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传入使中国出现了走向近代化的某些条件和可能。二是面临两个问题,即近代中国既面临着反抗列强侵略实现国家独立的问题,也面临着如何争取近代化的问题。三是需要分别主次,即近代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为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实施扫清障碍。他们两人以其文章论述的精辟性、学界地位的崇高性、讲话场合的重要性和发表刊物的权威性,对近代化研究的深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后,他们两人继续关注近代化与近代史的关系问题,“两个主题”的主张更趋明确,<sup>④</sup>使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同他们的主张,采用这一主一次两个主题研究中国近代史。

① 《中国近代史体系体例学术讨论会在湖南桑植召开》,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编《中国历史学年鉴(1988)》,第285—286页。

② 徐泰来《关于中国近代史体系问题》,《湘潭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③ 《中国近代史宏观研讨会在湖南大庸召开》,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编《中国历史学年鉴(1990)》,第306页。

④ 参见虞和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创新》,《晋阳学刊》2010年第6期;徐秀丽主编《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1979—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1993年,罗荣渠主持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和章开沅主持的“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这两个国家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都如期完成和出版。为了总结这两个课题的研究成果及其对中国近代化研究的影响,《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邀请章开沅撰写了一篇“特稿”。章开沅在文中说“中国大陆历史学界正式参与现代化研究,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当时首先承担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此项课题的有两家”,即他和罗荣渠承担的两个课题。其言下之意,就是说这两个课题的设立标志着中国学界的近代化(现代化)研究的正式开启。而且,这两个课题,“前者由世界看中国,后者由中国看世界,正好可以互相参照,互相补充”,<sup>①</sup>既可以构成全景式的中国近代化研究,也可以发挥全方位的学术影响,足见课题设计者的深谋远虑。这种影响力的具体表现,除了上述已列举的相关学术会议之外,还在于其所取得的众多成果,不仅各有最终成果的代表作,<sup>②</sup>而且还分别出版了两套丛书。罗荣渠的课题,已陆续出版“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五种(后来增至12种);<sup>③</sup>章开沅的课题,“陆续出版了近十本‘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sup>④</sup>其影响力所至,“除了上述两个课题组之外,还有许多历史学者,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学者,也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现代化研究”。这是由于“现代化研究开展以后,必然要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引进一套比较完整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其中有些问题,是我们过去不甚重视,甚至完全没有研究的。近十年来,与经济史、文化史研究迅速进展相伴随,还有城市史研究、商会与绅商研究、学堂学生群体史研究、教会大学史研究、留学运动史研究、大众传播媒体史研究、社会心态变迁史研究等等史学分支学科的崛起,这些都与历史学者对现代化研究的关注与投入有关。”<sup>⑤</sup>在此,章开沅从学术发展逻辑的深度,如实地总结了由两个国家课题设立而催发的近代化研究对中国近代史各个方面的联动影响。

由此可见,在这两个课题执行期间,近代化的研究视角和范式已经渗透到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多个领域,亦引起了近代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在当时影响之大无出其右者。其实,王庆成对中国近代化研究的设计有一种全盘性的考虑,是一套以近代化为主体的组合拳,在提倡这两个近代化研究课题的同时也提倡近代城市和农村研究,而城市研究的中心线索是近代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农村研究的重点也是农村和农业的近代性变迁,这无疑都是近代化研究的一个方面,或专题研究、微观研究。王庆成旨在通过设立各类课题,以达多方共振,交互作用,共同推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拓创新,使之与时俱进,更好地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 结 语

由上可见,王庆成在改革开放后的学术活动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他个人进行的学术研究,另一个是他为开拓近代史学科的出谋划策。两方面的交相作用,使他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大转

① 章开沅《现代化研究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寻求历史与现实的契合》,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编《中国历史学年鉴(199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页。

②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外早期现代化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③ 董正华《罗荣渠和他的现代化研究》,《思想理论教育导刊》1997年第11期。

④ 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序言”,第1页。

⑤ 章开沅《现代化研究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寻求历史与现实的契合》,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编《中国历史学年鉴(1995)》,第2—4页。

型中发挥了独到的重大作用。其中后者的作用比前者更大。除了上文已陈述的城市史和近代化两个最为突出的成就之外,他还提倡创新农村史、边疆史、文化史和华侨史的研究,也起到了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这也是他比其他创新者具有更大影响面的独特之处。王庆成之所以能做出这样的筹划,发挥这样的作用,与他能较好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紧跟时代需要,开放思想,重视国际学术交流扩大视野直接相关。他倡导的这些新研究领域,至今仍是近代史学科中的热门分支学科和主要研究方向。

改革开放后中国近代史的这种大转型,虽然从根本上来说是时代发展使然,但是从人为上来说是以王庆成为代表的这批率先与时俱进、锐意开拓创新的杰出学者促成,他们的这种贡献和精神值得我们崇敬,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王庆成等这一辈史学大师们在改革开放后的学术创新之路可以概括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时代需要为导向,以国立课题为引领,以重要机构为依托,以面向世界为借鉴,以振兴中国史学为目的。这一路径,对实现已经到来的再一次史学大转型,建立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历史学不无益处。

(作者虞和平,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特聘教授;邮编:430079)

(责任编辑:敖凯)

(责任校对:张舰戈)

## 《中国口述历史理论》

左玉河主编,人民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

该书为探讨中国口述历史理论的学术论文集,也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口述访谈录”的阶段成果。自20世纪80年代口述历史从西方引入以来,中国口述历史无论是理论方法的探讨,还是口述访谈成果的展现,抑或是口述历史学科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形成了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口述历史特色。中国口述历史发展呈现出多维度推进的发展态势,形成了多元化的发展格局,出现了多样性的采集方式及其成果呈现方式。该书共选编了国内学者的29篇有关口述历史理论的学术文章,分口述历史的性质及作用、口述历史与记忆问题、口述历史方法、口述历史现状及口述历史的应用五大专栏。这些文章有两大特点:一是理论的思辨性,着力于讨论口述历史理论方法问题;二是理论的创新性,着力选取在口述历史理论上具有原创性思考及新见解的论文。该书集中展现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口述历史理论研究领域的创新性成绩,总结了中国口述历史发展的宝贵经验,展现了中国口述历史学界的理论探索成果,旨在推动中国口述历史的健康有序发展。

### **Wang Qingcheng and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 Yu Heping**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a great transformation has taken plac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lthough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wa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that drove the change, it is necessary to recognize the significant role that a group of scholars played. Among these famous innovative and creative scholars was Wang Qingcheng. On the one hand, he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history, initiated the research o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and promoted social historical studies at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On the other hand, he advocated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some new research areas such as urban history and modernization studies in the national planning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the past anti-imperialism/anti-feudalism was the dominant them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With Wang's effort, a new dimension of modernization was added. The co-existence of these two themes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d to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 **Critique of Historical Nihilism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 Chen Tian**

Historical nihilism emerged in China in the mid-to-late 1980s.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environment at home and abroad, it developed from the initial denial of Mao Zedong's role in history and its d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to its deni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the Party, of new China and of the socialist development. It explicitly spread in big-character-poster style and implicitly infiltrated into academic work, extending its influence into daily life. Historical nihilism has undergone four important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changes. In each stage, it seeks different targets to deconstruct, and it is embodied in different content of academic analysis and judgement. Correspondingly, it also invites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s various refutations. Scholars in China have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it. They have been tracking its change and studying its trend closely and analyzing and criticizing it timely. They have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 **Subject, Media, and Content: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Shixue Yaolun*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China // Wei Lei**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the Commercial Press published Li Dazhao's *Shixue Yaolun* (*Historical Essentials*). After its publication, it became a credible source for many subjects. At the same time, this book was also disseminated in the form of some most advanced media in modern China, such as books, magazines, newspapers, and libraries. With the spread of the book, as its content was in line with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s demand, this book's views, theories, and ideas had been recognized by historians in China, who further spread its influence by introducing it to a wider audience and quoting it in their own research.

### **The History of Commemor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Memory: Reflections on an Academic Relation // Guo Hui**

In the context of historiography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istory of commemor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memory. In particular, historians in China have made some new achievements by incorporating commemorative activities into their studies. However, these activities are not always observed in the lens of the history of memory. In recent years, historians that study commemorative activities have been delivered fruitful results and gradually formed their own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Most of their findings are more related to commemoration than to "memory". Its absence of distinction of the history of memory from that of commemorative history has presented the field with many problems. It is urgent to deal with criticisms in a positive way to rethin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 clearer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history of memory will increase historians' methodological self-awareness, help them to focu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select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raise their problem consciousness, and so on.

###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eld of Contemporary World History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 Li Shíán, Li Na**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the only scientific standpoint in historical studies. As early as in the Yan'an